

第七章 結論

綜合整個研究發現，我們可以歸納出三個主要的方向：第一是美日安保發展的過程，以及它所帶給美日兩國的意義與戰略價值；第二是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評估；第三是從中共外交政策面向出發，探討冷戰後中共提出新型外交概念的目的，並且著重在胡溫體制下「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那它與美日安保同盟體系有何關係與影響？並試圖觀察彙整出中共對外行爲的原則、方法與手段。

（一）美日安保的發展

1960年修改的美日安保條約，是日本調整與美國關係的一個重要事件，象徵著50年代雙方「磨合期」的結束，兩國關係因而進入60年代的黃金期。然而，60年代後半期，由於越南戰爭，使美國元氣大傷，由於經濟實力下降，美國也無法繼續負擔給予相對弱小的國家的安全保證，因此，美國之所以在1972年同意將沖繩歸還日本，也是想藉此使日本在亞洲負起更大的責任。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爲西方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成爲美國在經濟上的競爭對手，美、日之間逐漸產生隔閡，70年代發生的兩次石油危機，日本不顧美國制止而採取自主性的行動，使得美、日的矛盾公開化。到了80年代，日本更進一步提出了走向「政治大國」的戰略目標。到了90年代，美國與日本之間的經濟關係愈加密切，美國以「日圓升值」以及「超級三〇一條款」的政策，使得日本經濟發展趨於遲緩。雖然美、日兩國在經濟上有所衝突，但是日本在安全防衛上需要美國，美國在戰後的「美國支配下的和平」（Pax American）也需要有日本的協助。因此，在亞太地區，日本變成爲美國最有力的伙伴。

美日安保條約是美日兩國在東亞安全上，一切行動的合作基礎，而1997年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更是確定美、日兩國在面對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安全保障體制下的同盟設計。以及兩國在處理有關「日本周邊有事」各項緊急事宜時的行爲準則。同時，美日安保合作雙邊關係的再定義以及強化，不僅是調整後冷戰時期兩國雙邊關係的作法之一，也可以避免因爲貿易摩擦而波及雙方既有的軍事合

作。

美國與日本在安保條約上的修訂，吾人可從中發現兩層意涵，首先，對美國而言，美日安保關係的強化，不但意味著美國在亞太地區已經無法以「實質」上的超強自居，而需要日本作為此區域的最有力伙伴；另一方面，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說法，美國與亞太地區如澳洲、南韓等國紛紛發展或強化雙邊安保合作關係，也象徵著美國政府的亞太策略正逐漸走向以雙邊機制做為今後發展多邊安保架構的基礎。

對日本而言，與美國進一步發展同盟關係的結果，也有兩點不同的意義。第一，二次戰後由於美日安保條約的存在，日本得以長期依附在美國的核子保護傘之下，不必擔心受到其他國家的武力攻擊，因此，歷任政府莫不全心全力的以發展經濟為首要施政目標，因此日本目前已然成為一個經濟強國。其次，雖然日本憲法規定日本不得擁有軍隊，但若與世界各國相比，日本的軍事裝備及武器設施卻毫不遜色，其軍費也是全球第二。日本與美國在1998年9月21日，就共同發展區域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of Missile Defense, TMD）達成協議，更於1999年8月16日簽訂有關共同開發TMD的協議備忘錄。而日本也從1995年就編列預算，開始進行基礎性的研究。經過1998年這次的美日安保協議委員會，日本也在1999年的預算中編列高達近十億日圓的金額，正式進行和美國的技術研發。對於美國與日本加強防衛合作關係，而且進一步還共同發展飛彈防禦系統的行為，亞太地區的國家的回應不一。¹對中共而言，美國與日本在冷戰時期的安保合作，所針對的目標乃是蘇聯，而非中共本身，因此，中共並沒有強烈的反對。然而，冷戰結束後，美、日之間的同盟關係，表面上雖然是以北韓為假想敵，但是在美、日內部在「中國威脅論」聲浪的充斥下，中共無異成為美日安保所要注意的對象之一。此外，中共認為日本藉由北韓試射衛星為理由，與美國聯手發展戰區飛彈防禦系統，可能刺激區域「外空領域的軍備競賽」，進而影響亞太地區的和平與

¹ 丁樹範，「中共對美國戰區飛彈防衛計畫的態度」，**問題與研究**，第38卷第11期（1999），頁1-10。

穩定。中共除了反對除了美、日共同研發飛彈防禦系統之外，也對於美日安保宣言中的「日本周邊地區」提出抗議，因為從「新指針」發佈之後，即使是日本政府內部對於究竟何謂「周邊事態」也缺乏一個清楚的定義。而到了2005年2月19日，美日安保聯合聲明，明確指出「周邊有事」的範圍，此舉令中共大感威脅，加上中日之間所分析的結構性問題，以及日本近年嘗試朝正常化國家邁進，這都影響到美中日三國的互動。

美國雖然在亞太地區有十萬人的駐軍，也與各國有雙邊合作的協議，但是由於此區域的情勢並不穩定，不僅僅有北韓試射飛彈的威脅存在，中共積極發展軍備以及南韓對於加入戰區飛彈防禦系統的意願反覆，這都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佈局。因此，日本與美國的結合，不啻是為穩定亞太和平與安全的一個基石。美、日等國也逐漸了解到，唯有透過「建設性交往的外交手段」，才能與中共及北韓等激進國家增加友好關係。因此，除了美國與日本發展更密切的同盟關係外，吾人更必須注意及觀察的重點，即是未來亞太各國是否能夠如同美、日安保條約一般，發展一個以雙邊關係為基礎的密切關係，進而形成「複合式」的多邊機制來因應區域性安全問題且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

（二）中共對美日安保的評估

根據研究，冷戰時期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評估，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²從建立政權到1972年與日本建交，中共將美日安全關係視為美國圍堵共產集團的一環，此時期的日本主要是作為輔助美國的角色，從1951年以及1960年的條約內容來看，在1960年的日本角色雖然相對地位提高了，自身所擔負的責任也較1951年條約內容為重，但是對於美國來說，日本是做為美國在亞太的一個重要的基地以及盟友，並且要求日本負擔更多的軍事及財務責任。進而我們在探析中共的外交政策時，在1949年-1956年階段，中共所採行的主要是「一邊倒」政策，毛澤東在1949年訪蘇聯時，與史達林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以獲得蘇聯經濟、技術的援助，象徵中共在建國之初，選擇了結盟的外交政策，之所

²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關的形成」，頁4-9。

以提出一邊倒向蘇聯的政策，除了直接獲得蘇聯在建國初的大力援助外，另一方面可視為對美國軍事的威脅、政治的孤立及經濟的封鎖所做出得回應。為了表示對蘇聯的友好，毛澤東於 1950 年派遣志願軍參與韓戰，與美國對抗，以示效忠蘇聯陣營。中共的參與韓戰，等於公然向美國宣戰，並徹底粉碎了美國企圖拉攏中共抗蘇的幻想，而美國也轉而將中共定位為共產集團的一員。在此認知基礎上，美國與中國大陸周邊的國家進行同盟防禦工作，而美日安保正是此一同盟的主軸核心。而到了 1956 年至 1960 年，是中蘇同盟裂化的時期，其原因在於 1956 年毛澤東赫魯雪夫發動貶史達林運動，並對西方世界提出和平共存的政策，1957 年毛澤東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共黨大會時，批評蘇聯為反修正主義，從此中共與蘇聯的矛盾逐漸表面化。而值得注意的是，到了 1972 年，中共與日本建交，而此時期美國也不斷對中共釋出善意。綜觀此時期中共對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從一開始採取敵對的態度到與蘇聯分道揚鑣，而漸漸對美日關係採取較為親近的政策。

第二階段是中共與日本建交至 1982 年提出獨立自主外交，中共在反蘇統一戰線的需求下，美日安全關係反而成為對抗蘇聯的工具。但在此階段，中共與美建交後在台灣問題並不如預期，而在與蘇聯劃清界限，也妨礙了中共與其他國家的發展，因此中共在 1982 年十二大提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強調在國際上不結盟、不對抗以及不針對第三國。但此時期中共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頗感疑慮，加上 1978 年防衛指針，日本在武裝上變成積極角色，反觀中日雙方問題日益加深，包括歷史教科書、光華寮事件、靖國神社參拜問題，而日本的國防預算也逐漸升高，都在在突顯中共對美日同盟的憂心。

第三階段為 1982 年之後，此時期美日安全同盟有了重大的發展，此時期也是面臨國際秩序重整的時代，此時期蘇聯瓦解，冷戰結束，美日同盟以蘇聯為假想敵的基礎頓失，而在 1991 年波灣戰爭的經驗，也促使美日兩國重新思考定位與發展，在 1997 年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前，美日雙方就之前發表過幾篇重要報告，包括 1995 年美國東亞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堅稱繼續維持亞太地區和平發展

與穩定，並繼續在亞太駐軍；1995年日本發表防衛計畫大綱，強調美日同盟對日本安全的重要性；在1996年美日雙方更共同發表「美日安全聯合宣言：邁向21世紀的聯盟」，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宣言中更肯定美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雙邊安全關係，其共同安全目標是維持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之後有了1997年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的簽訂。因此美日雙方同盟關係的強化，這意味著對於中共來說是一項警訊，基本上它衝擊到中共的國家利益。而近期以來美國的中國軍力報告、四年一度國防檢討報告(QDR)，也都透露出對中國軍力頗感憂心，甚至日本的防衛計畫大綱也同樣將中國視為威脅，這也顯示出中共的軍力逐漸上升，而有成為亞太區域霸主的意味存在。

(三)「和平崛起論」對中共的外交政策意涵

作為一個外交及發展策略，「和平崛起」自有其國際因素，一般認為「和平崛起」顯然是針對「中國威脅論」和「中國崩潰論」而起，在國內意識型態領導權上，對內則防止極左路線抬頭，胡溫並藉此理論有別於江澤民「三個代表」之治國方針。

而將和平崛起運用在中共對美日的關係上，基本上胡錦濤上台後，還是繼續延續江澤民主政後的動力，在不與美國爭霸的主軸下進行不對抗、求合作的政策，但在911事件後，美國打著反恐旗幟與中國周邊國家如南韓、菲律賓進行反恐軍事演習，強化與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合作，與東協國家簽訂反恐的聯盟，特別是美國駐軍中亞，與中亞各國進行軍事合作，都讓中國產生美國借反恐之名，行圍堵中國及擴張霸權之時不安感。而中國官方或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已取代前蘇聯成為美國的假想敵，並將戰略中心移至亞洲。只是在現實主義的外交思維上，中國為確保其經濟改革的持續，需要來自美國及西方的資金投資與技術移轉，短期間內，除非雙方有重大衝突，否則中國還是必須與美國維持既競爭且合作的矛盾關係。另一方面，針對日本在911事件後的反應行為，中國認為日本藉反恐主義提出違反日本憲法的法案，並趁機派遣艦隊遠赴印度洋，意圖走向軍事大國，然而為了不影響中國追求經濟發展的目標，未來中國對日本的政策，原則上將以

推動經貿往來為主，防止日本向美國過度傾斜，並走向軍國主義。